

大雅叢刊

中國式資本主義

——臺灣邁向市場經濟之路

魏
萼
著

／三民書局印行

大雅叢刊

中國式資本主義

—臺灣邁向市場經濟之路

魏

萼
著
／
三
民
書
局
印
行

中國式資本主義\臺灣邁向市場經濟
之路／魏萼著．--初版．--臺北市：
三民，民82
面； 公分．--（大雅叢刊）
ISBN 957-14-1972-9（精裝）
ISBN 957-14-1973-7（平裝）

1. 經濟地理—臺灣

552.2832

81006777

◎ 中國式資本主義
——臺灣邁向市場經濟之路

著者 魏萼

發行人 劉振強

著作人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審權人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所 地址／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六十一號

郵撥／〇〇〇九九九八—五號

初版 中華民國八十二年三月

編號 S 55138

基本定價 肆元貳角貳分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二〇〇號

ISBN 957-14-1973-7（平裝）

序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幾乎所有經濟後進的國家，都致力於經濟發展的追求，中華民國台灣地區以成長快速、物價穩定與所得分配公平脫穎而出，創造「經濟奇蹟」，被譽為「台灣經驗」。美國故未來學家赫曼·康 (Herman Kahn) 認為，世界經濟發展中有兩個半英雄，兩個是中華民國台灣地區和南韓，半個是日本。他的理由是：美國自一七七六年獨立建國至一九七六年二百年在經濟發展方面的成就，日本花了一百年，而台灣和南韓只需要五十年就可以達到。他又稱台灣、香港、新加坡和南韓為四個小老虎，或稱四小龍。

台灣並無豐富的自然資源，毋寧相當貧乏，且有強敵的威脅，與沈重的軍事負擔，何以經濟却有這樣優異的表現，經濟學界已有很多文獻，嘗試加以解釋，並以台灣經驗提供其他發展中國家參考。魏萼教授在這本大作《中國式資本主義——台灣邁向市場經濟之路》中，提出了他自己的看法。

正如本書的書名所顯示的，魏教授從台灣經濟制度的特色探求其經濟發展成功的原因。根據魏教授的觀察，台灣的經濟制度是具有中國特質的資本主義 (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或中國式的資本主義 (the Chinese-style of capitalism)，對照之下，他稱大陸地區的經濟制度為具有中國特質的社會主義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或中國式的社會主義 (the Chinese-style of socialism)。所謂中國式的資本主義，是由中國傳統主流經濟文化與歐洲傳統主流經濟文化交織而成，也就是在以私有財產為基礎的市場經濟之中，加入政府功能，包括國營事業、經濟計畫與經濟政策，以補純粹市場經濟的不足。

事實上，純粹的市場經濟與純粹的計畫經濟，如今並不存在，幾乎所有國家的經濟體制，都是市場加政府的型態。在現實世界中，資本主義經濟與共產或社會主義經濟的不同，在於前者是以市場為基礎加入政府，後者則以政府為基礎加入市場，而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各國之間的不同，主要在於政府扮演的角色。就這一點而論，魏教授所說的中國式資本主義不同於西方資本主義之處，從我看來，在於政府在經濟發展中扮演比較積極的角色。在這種情形下，政府的發展政策是否正確，所採取的措施是否恰當、適時和有效，乃成為經濟發展成功與否的重要因素。

魏教授認為，從民國三十八年到七十八年，台灣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特色，是從強調農業、到工業、到商業，而在工業發展方面，則從勞動密集、到資本密集和技術密集，循序漸進的發展。在政府與民間的配合方面，則以政府的計畫、政策與國營事業協助民間追求財富。中國自古主張「藏富於民」，民富則國強。孟子曾經說：「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國父孫中山先生也說過，他的民生主義就是發財主義：讓大家發財。

魏教授在他的這本大作中，回顧了台灣經濟發展過程中一九五〇年代的進口代替，一九六〇年代的出口擴張，一九七〇年代克服能源危機，以及一九八〇年代在世界經濟困難的環境下繼續締

造經濟發展的佳績。他並強調我國傳統儒家文化勤奮、好學與重視倫理，對台灣生產力提高與社會和諧的重要貢獻。

民國八十年九月，新加坡《海峽時報》報導了李光耀的一段高論，他說：「勤勉、節儉、重視教育、信靠鄉里、互助等儒家價值，使得中國人家庭團結一致，教養子女，讓他們教育良好，鬥志高昂，在壓力下表現優異。」李光耀先生這一段話，可以支持魏教授關於儒家文化對台灣經濟發展貢獻的看法。

我也願意藉著這個機會，就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功能，表示一點簡單的看法，給魏教授的大作作一註腳。根據世界銀行的一份研究，自從一九五〇年以來，發展中國家實施了三百多個經濟計畫，就其在一九七〇年代的表現而言，最成功的例子，既不是計畫周詳且政府大力干預，也不是對計畫不加重視，而是具有良好的總體計畫結構，作為公共投資規畫的依據，同時並提供良好的獎勵作法，以引導私人部門的發展。這正是中華民國政府過去推動經濟發展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我常常引用華特（Frank Wolter）教授的看法：政府部門小的時候，經濟成長快，政府部門大的時候，經濟成長慢。政府強則經濟弱，希望一心一意想建立大有為的政府者引以為戒。

魏萼教授和我是老朋友，民國五十二學年度，他在台大經濟系四年級的時候，我恰好接替施建生師授四年級的必修科「經濟政策」。回首前塵，幾乎快要三十年了。其實我那時候自己尚在一知半解的階段，談不上能對他們有甚麼貢獻，只希望還沒有達到誤人子弟的程度。如今他們這一班同學，有很多在學術上和事功上有很大成就，常有機會和我見面的像中央銀行的副總裁邱正雄先生、國

庫局的局長薛維中先生，和中國信託銀行的總經理駱錦明先生，魏教授也是其中的一位。我覺得十分欣慰。

民國六十年代初期，魏教授從美國聖路易獲博士學位回國後，有很豐富的工作經驗。他曾經在台大經濟系和三民主義研究所任教，並曾受執政黨徵召擔任文化工作會的副主任。晚近他兩度赴美，先後在史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和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並在美國懷俄明大學、俄羅斯莫斯科大學及大陸廈門大學擔任客座教授，現在是中山大學經濟學教授和亞洲與世界社主任。本書是他的英文大作 *Capitalism: A Chinese Version — Guiding a Market Economy in Taiwan* (在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東亞研究所出版) 的中文版，是近年魏教授繼《一個悲劇的開始：台灣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變》(*A Tragic Beginning: Uprising of January 28, 1947*，在史丹福大學出版) 一書以後的力作。承他的盛意，要我作序，甚以為榮。

孫 震

民國八十二年二月十四日

於國立台灣大學

自序

在寫本書時，首先，我願向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的馬若孟教授(Ramon H. Myers)致以衷心謝意。他是在臺灣經濟界享有盛名的專家。馬若孟教授曾鼓勵並幫助我從胡佛研究所得進行此項研究的經費。沒有他的幫助，本書的寫作則絕無可能。

我也願向加利福尼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斯卡拉皮諾教授(Robert A. Scalapino)表示謝意。是他把我從臺灣複雜的政黨政治關係中拯救出來，並重新帶回到學術研究領域中來。1983年夏，那時我正擔任蔣經國主席領導下的國民黨文工會副主任職務，接到了出乎意外的邀請。此邀請函係由斯卡拉皮諾教授所簽發，邀請我來加利福尼亞大學柏克萊分校做研究工作。接到他的邀請函以後，1983年底，我決定離職赴柏克萊。若無斯卡拉皮諾教授的幫助，雖然我當時仍是國立臺灣大學的經濟學教授和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員，我也不可能有機會專心回到學術界來。

我還要感謝哈佛大學的約翰·費正清中心主任麥克法夸爾教授(Roderick MacFarguhar)，和懷俄明大學國際合作部主任翟文伯教授(Win-berg Chai)等。我同這兩位先生曾深入討論過儒學的資本主義文化與社會主義文化領域內的經濟比較研究，因而為我寫作本書提供了頗有價值的見解。

1990年3月，維吉尼亞大學冷紹烜教授(Shao Chun Leng)

發起召開了關於蔣經國與臺灣現代化的討論會，這次會議爲我提供了一個重新評價蔣經國對發展臺灣經濟所做貢獻的難得的機會。那時我特別高興能有機會同耶魯大學的費景漢教授(John C. H. Fei)和加利福尼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的墨子刻教授(Thomas A. Metzger)一起討論了臺灣的經濟經驗。他們在維吉尼亞的夏洛茨維爾召開的會議中提交了所寫的關於臺灣經濟的重要論文。

另外，我還要向科列索夫教授(Vasili P. Kolesov)和曼瑞金教授(George R. Manrykin)深致謝意。他們分別是國立莫斯科大學經濟系主任和國外經濟學部主席。當我訪問蘇聯時，由於他們的款待，使我能有機會把本書的基本概念介紹給國立莫斯科大學經濟系的師生們和蘇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及世界社會主義國家經濟研究所的專家們。這次經歷使我得到鼓舞和信心，促使我盡可能快地寫完本書。

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胡繩教授與副院長劉國光教授、汝信教授的多次訪問邀請，爲我提供了機會，得以訪問中國的重要領域，並同社會科學院及北京大學的各個經濟學專家們一起討論本書的構思。他們的評論和論戰性意見使我對本書某些有爭論性論點做了一定的修正。

我還要感謝加利福尼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高若恩教授(Joyce Kallgren)和高棟民教授(Thomas B. Gold)。他們在1988年8月主持召開了中國經濟關係討論會，使我有機會將本書的來龍去脈表達給中國的經濟學家們，也請他們指正。諸如：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趙人偉、臺灣研究所所長陳憶村、上海社會科學院院長張仲禮，以及其他傑出的經濟學者：梁宇藩、章嘉琳、吳明瑜、

高希均、于宗先、劉泰英和陳明等先生，在此我對以上各位表示深切的感謝。北京大學校長吳樹青教授、廈門大學副校長王洛林教授及臺灣研究所所長陳孔立教授等的邀請訪問，使我有機會講述本書部分內容給北大和廈大的年輕學者們，其意義更是重大；享譽中外的國學大師南懷瑾教授給我許多指導，使本書增色不少。

還有，我要特別感謝加利福尼亞大學柏克萊分校中國研究中心的薩平頓女士(Kerilyn Sappington)，她幫助我編輯了這本書。沒有她的熱心幫助，則本書絕無可能問世。因此，對她的貢獻，我將永遠不會忘記。最後，我也要感謝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戴天先生，若沒有他的協助翻譯成中文，本書中文版的問世也無可能。因為本著作原來在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東亞研究所出版的，特此致謝。

評 介

二十世紀已爲二個獨一無二的社會所產生的財富和權力做了見證：創造了取代市場空間的機構亦或設計引導市場的工具。這個遍及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已在這一大部分失敗，因爲每一個國家從不會發現一個適當的替代品來代替市場空間。但導引市場去擴大社會財富已在拉丁美洲、非洲、中東以及部分亞洲國家產生了不良的示範效果。國家干涉市場機能來發展新工業，他們以通貨膨脹、弱勢政府、高失業率和貧窮來產生了經濟困境。

然而這種情形在東亞是有些不同的，那兒他們的領袖和官僚成功地開展了經濟改革。英國作家薩奇(Saki)曾說過：這是一個對中生代改革者的安慰，假如這些推動的利益在他們這一代還存在的話，將一直延續到他們下一代。那些中生代的改革者指導了中華民國的改革和政策，引導了他們的經濟去創造一個遠超出他們夢想的繁榮。

在東亞有存在一個獨一無二的中國式資本主義嗎？如果用比較是會誤導一般大眾。香港的繁榮經濟是由中國人所創造的，但卻是英國在沒有加重高成本的保護主義下管理而成。新加坡也只是一個沒有龐大管理的皇室經濟和許多城市複雜性的城市國家(city-state)的組成而已。臺灣則不相同，它有一個提供人民高成本國家保護的政府，它的經濟也是複雜的，而且包含了鄉村和城

市。但臺灣的經濟成功與它屬於小型面積有很大的關聯。已故哈佛大學教授費正清(John K. Fairbank)的話亦總是提醒我們：如果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任一個省分都能得到像是日本或其他國家投資在臺灣上的有利資源，那麼它也是會一樣成功。這種宣稱是錯誤的，而且與這種大小的因素是沒有關聯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總是承諾去實現約翰·蓋斯薛(John Ortega Y. Gasset)所描述的革命：「革命不是反抗現存秩序的暴動，但這是一個新秩序相對於舊秩序的建立。」藉著創造一個與中國人感情傾向不相容的機制，共產黨員已扭曲了中國社會和經濟而產生不良功能，這種情形是很廣泛的存在於中國境內。

將近四十年來，中華民國面對兩個主要的威脅，影響臺灣經濟持續的發展，如此也為這個政體和它的人民帶來了不小的災難：一是中國共產黨軍事威脅，二是國內外存在都有推翻國民黨政府和建立一個獨立的臺灣共和國的渴望。東亞沒有一個國家曾同時遭遇到如此二種災難。

若將安全威脅的議題放在一旁，中華民國繁榮的成功是導因於經濟機構和政策引導資源到高附加價值使用，克服了市場衰退，消除了擾亂國內市場機能的外部障礙，而且也降低了在需求面和供給面無法預期的轉變所造成的市場變動。這些成功的故事都會在魏萼教授的研究中明示出來。

魏萼教授也一再的提醒我們，中華民國領導者和官僚們的理想均調整了市場機能在生產因素(投入)和最終貨品、服務(產出)二者方面。國父思想的確影響了政治領導者和文官體系，在介入市場機能方面，也指導了避免因財富擴大所引起的貧富不均的現象，

使市場機能保持一種穩定，並且防止通貨膨脹的產生。特別重要的是中國經濟機構和市場的特點與中國人重視教育、辛苦工作和節約的性格相結合。

魏萼教授在解釋國家政策和國營事業的角色時，認為它們與中國大陸經濟改革有相當的關聯。臺灣的經濟政策將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不適用後逐漸汰舊換新，臺灣的國營企業也將部分民營化，而且政府經濟的角色將會限制容許讓私有部門再加以擴大。當大陸的領導者在實現此相同的經濟政策時，則中國大陸經濟政策將會逐步開放與改革，終將與臺灣的混合式經濟相似。這個過程不正在進行中嗎？

臺灣經濟現已再度調整了一個新的市場力，如此引導了過多的存款和資金到中國大陸南方或其他地方。臺灣經濟在重新建構和提升科技水準方面已面對了一個新的挑戰，目前亟需克服的困難和障礙或許不比過去嚴重，而過去的確實已經解決了。

而這些重要的論述將在魏萼教授這部著作中呈現出來。（亞洲與世界社馬瑜明譯）

馬若孟

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資深研究員

臺灣大學經濟系客座教授

評 介

目前，臺灣奇蹟式的經濟發展經驗已是公認的事實。許多不同領域的學者，都已經對這個資源匱乏、人口過多，又受中共強大軍事威脅的小島，何以能從1950年代動盪的政經環境中穩定下來，並將貨幣與資源適當導引以促進經濟發展的過程，提出了許多解釋。本書作者，魏萼教授——臺灣經濟方面學識淵博的專家，也曾是兩任經濟部部長的顧問，建議我們要了解臺灣經驗可以同時從政府的經濟角色與儒家資本家文化兩方面下手。他強調，關於「資本主義」概念本身，特別是自二次大戰後的開展，我們需要有一個新的了解。他提醒我們注意一項事實，即當代的資本主義是社會資本主義，此與傳統的自由放任資本主義不同。因為政府在公共支出、公共福利以及經濟的直接參與上，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不過這並不違背資本主義私有財產和自由市場的理論基礎。

魏教授從一般的觀念——儒家文化與資本主義之間的對立著手。所引用的例子不只是臺灣，尚包括日本、南韓、新加坡及香港等包含於儒家文化圈的國家。魏教授表示儒家文化下的政府提倡的是政府和人民的分工合作，而非為阻礙經濟發展的來源。政府官員的角色是為國家服務，而人民則有責任努力工作以促進繁榮。某種程度上，這包含了政府積極參與創造所謂的良好投資環境，以便讓私人有正面的回應。接著，他詳述了臺灣政府所採行的方法，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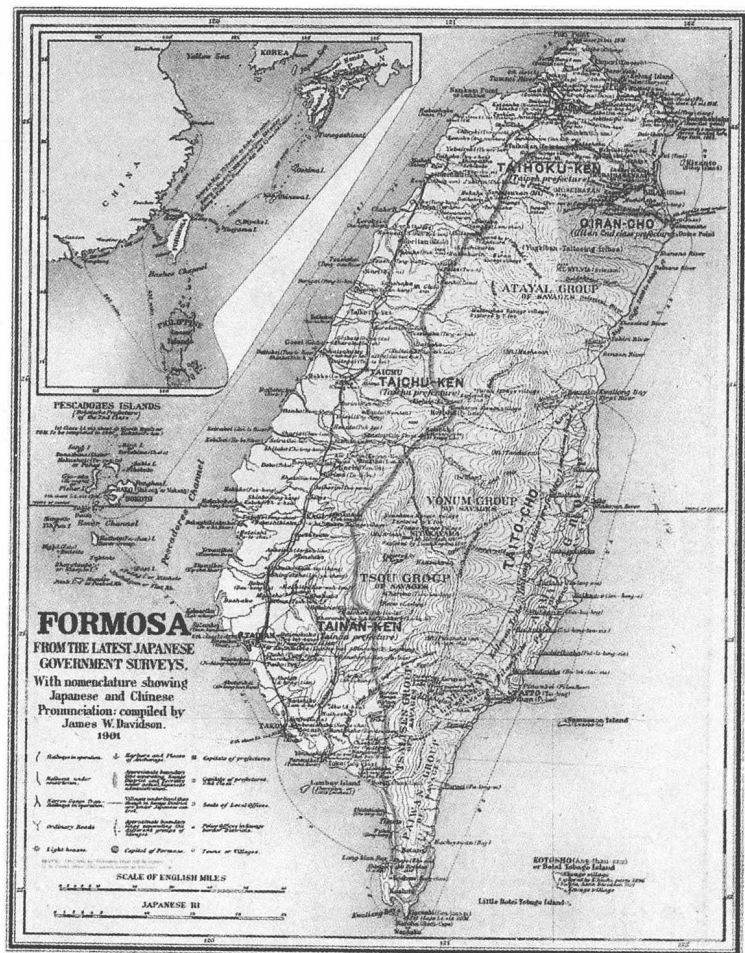
且也提到 國父孫中山先生經濟思想的理念——孫中山先生提倡強而有力的政府角色，但是也鼓勵本地及國外的私人資本投資。

魏教授認為，臺灣經驗雖然不是沒有缺點，但它還是對其他開發中國家提供了有用的參考經驗。從這個觀點來看，他的研究充滿著刺激性的議論，值得吾人深入探討。（亞洲與世界社楊佩綸譯）

高棣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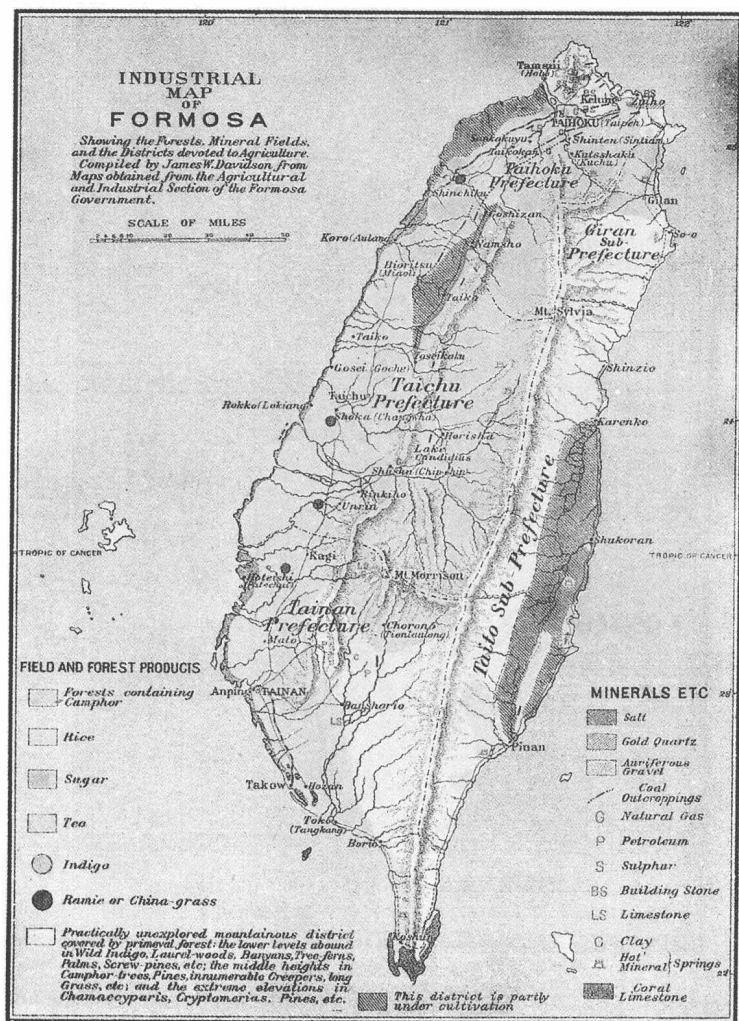
加州柏克萊大學中國研究中心主任

台灣地理經濟鳥瞰



資料來源：James W. Davidson, *The Island and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
台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民國 77 年 10 月影印。

台灣工業園區位置圖



資料來源：James W. Davidson, The Island and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 台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民國 77 年 10 月影印。